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我们没那么容易被商业游戏愚弄

超女超男节目引起舆论和公众的热烈追捧,总有些自命为主流的道学家以“世人皆醉惟我独醒”的悲悯情怀看着痴迷的大众,提醒大众不要中商业炒作的毒“娱乐至死”。去年有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批判超女是“对艺术的玷污和青少年的毒害”,今年值超男如日中天之际,中国文联副主席曹志刚又向公众布道了:如果选秀节目只出于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些人的个人追求而一味地炒作,那就是愚弄群众、对社会不负责任。

(7月8日《信息时报》) 利益驱动娱乐,商业操纵选秀,这简直是绝对真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个利益追逐无孔不入的时代,有几人几事不在逐利而生为利而存?就算号称“人民艺术家”主打的央视“同一首歌”和“心连心艺术团”,没有地方政府的豪奢放血,哪里请得动孟欣导演;没有公款追星的财政基础,“心连心”才不会理你;没有体面的出场费,几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慷慨出场;就算最主流的央视春晚吧,哪年不搞去多少观众的有奖竞猜短信费?如今还有几个像常香玉、马三立那样真正的人民艺术家,那些戴着主流面具的人搞起钱来毫不含糊,这年头,套用韩寒的话来说:主流算个P,谁也别装B。商业利益支配公众眼

球,选秀节目的大众迷狂中确实包含着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但我想,这个道理并非只有刘忠德、曹志刚之类自命主流的道学家们懂,公众绝不是白痴和傻瓜,绝不是商业操纵之魔弹一击即倒的玩偶,当他们坐在电视前被选秀吸引,当他们拿起手机花钱发短信时,未必不知道这是一场商业操纵和一次娱乐游戏,未必真正沉迷于此,而仅仅也是以玩乐和游戏的心态参与其中,公众不会轻易被这种旗帜鲜明的商业逐利所愚弄。

不怕曹副主席笑话,我前几天就看超男4进3了,接着也准备看3强对决,对此我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和商业认知,观看纯粹是获得一种放松和快乐,辛苦一天后,我需要轻松,讨厌央视有些节目板着脸孔的教化、庸俗的沉重和自以为主流的傲慢。当天看完哪个超男离开舞台,流下几滴廉价的眼泪后,或轻松地笑了几回后,第二天早忘得干干净净,投入了主流的生活接受主流的规划。所以说曹志刚称“选秀愚弄群众”,这太低估群众的智商和情商了,这个民智绝不比官智低的开放时代,民众哪里会轻易被一个选秀节目所愚弄。说“操纵”太重了,商家也就是想赚点钱;说“愚弄”更小瞧公众审美判断力,群众也就是想获得一种轻松和快乐。这年头,谁

会被人轻易愚弄啊,也不知道是谁弄谁、谁玩谁呢。

当然了,不可否认有些怀春的少男少女会被“愚弄”,也不可否认商业操纵中包含着一种娱乐至死的危险,正像赫胥黎所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会在选秀的喧哗与骚动中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但这种“商业愚弄”毕竟是非强制性的,公众自主选择意味很强,这种“愚弄”尊重市场的选择和观众的判断力,也符合文化多元的开放理念——而如果是政府部门以文化主导权强制设定某种东西为主流、强制公众接受某种文化的话,这种“公权愚弄”就很可怕了,正像奥威尔所描述的那样:有人控制着我们的文化消费,我们只能接受一种选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任何文化都被公权统摄于一种价值观念之下。这是一种真正的愚弄,组织性、强制性、让你毫无选择选择的愚弄。

相比之下,“商业愚弄”虽然会导致文化平庸和泛娱乐化,但在尊重市场的自由抉择中还是有生命力的,而公权愚弄则会导致文化的窒息和枯萎,这种“强令一统”的愚弄是文化最大的敌人,刘忠德、曹志刚之类的言论则包含着这种文化专制意识。

(作者曹林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媒体思想之长平专栏】

“诤言奖”是对大众媒体的羞辱

云南省政府前段时间首创新言奖的消息发布之后,可能出乎主办者的意料,立即遭到媒体人士的广泛批评。也有个别媒体人士予以支持,并表示了对批评的惊讶:政府问计于外脑,我们鼓掌欢迎,问计于百姓,为什么反而遭到批评呢,难道不是老百姓更了解自己政府的问题吗?

这个惊讶其实没有弄明白批评者的意思。批评者从来没有否认问计于百姓的意义,而且正是基于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才批评云南省政府的方法不对。正如大家已经指出的那样,集纳诤言并予以奖励并不是云南省政府的首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甚至比这做得更好。两千多年以来,直到今天,就算没有明确地设立什么奖项,这种奖励却一直存在。它的问题不在于诤言,而在于集纳诤言的方式是单向控制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方向正好相反。

这些持批评意见的媒体人士没有说破的一点是,这种方式其实是对大众媒体的羞辱。从现代文明的分工上说,大众媒体的职责,一是信息发掘和公布,二是舆论监督,完全包含了集纳诤言的内容。大众媒体整天在那里奔波奋斗,努力调整自己的角色,承担自己的职责,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政府完全无视于自己的存在,需要集纳诤言时,还要另起炉灶,成立什

么诤言奖领导小组办公室,愚赏以求。这就好比明明有一支天天训练的警察队伍,政府需要维持治安时,却临时重金招募一批保安人员,警察们感觉惊诧莫名一样。

政府作出这一抉择等于宣布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无用,否则那个诤言奖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了。媒体的确应该感到羞辱,而不仅仅愤怒的是,直言批评政府、广纳百姓意见方面,自己真的几乎是没用的。领导一讲话,媒体就觉得重要;政府一决策,媒体就高呼英明。批评者说,诤言奖表达的意思是“我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诚实地讲,对于多数媒体而言,你让它批评它也未必敢真批评,它会化批评为表扬——政府敢于接受批评,多么伟大啊。是啊,你还是让我表扬吧,这样心里才踏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政府要真的获得诤言,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从财政中拿点钱出来奖励,也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羞辱一下大众媒体,倒是一个很英明伟大的决策。

没错,在大众媒体不能满足集纳百姓意见的需求时,政府另辟蹊径,也无可厚非。但是,云南省政府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信息要不要公开?你要从纳税人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作奖金,你这个评奖小组的办公费用和工资用的也

是纳税人的钱,岂有秘密作出的道理?

政府撇开现有大众媒体,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台,公开透明地评选,并允许讨论和批评,等于是新开设了一个媒体,那也好说。但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利用政府资源支持某家媒体的垄断行为。

我本来以为应该讨论的是这个垄断问题,因为云南省政府规定,“诤言以3000字以内的书面文字表达,国内外人士的诤言可通过直接送达、邮寄或向云南发展网‘诤言专栏’发送”。查一下这个云南发展网,是政府研究室办的一个网站,其普及程度肯定比不上多数大众媒体,莫非趁机来提高点击率?但是几天之后,这个网站发了一则声明,称“考虑到保护诤言者的隐私和作者著作权等因素,办公室要求我网站不能随意公开诤言者的个人情况及诤言内容。今后,办公室将收集到的诤言进行初选,对符合诤言基本要求的,每个工作日未对所收诤言题目进行公布”。这个声明比较奇怪,既然是公共问题,有什么隐私可言?

这个声明的主旨是,连公布诤言题目都要经过审查。这完全印证了批评人士所说的“密室政治”、“耳语政治”的特征。如此诤言奖评选,不仅羞辱了媒体,也羞辱了人民。(作者长平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政府应带头雇佣传染病源携带者

■今日视点

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副司长刘丹华7月13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刘丹华提到,现在《就业促进法》正在修改当中,现在已在草案中增加“用人单位不得以求职者是传染病源携带者为由而拒绝录用”这一条。

(7月13日《中国政府网》) 曾几何时,此起彼伏的“乙肝歧视案”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有一些歧视者最后赢得了官司,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歧视仍然四处可见。此次修改中的《就业促进法》有意增加保护传染病源携带者正当求职权的条款,可谓是法律对社会上流行

“乙肝歧视”最好的反击。

但我们知道,有了法律并不就必然代表着最终的正义,有的时候,促使法律落实往往比立法本身更重要,否则的话,如果违法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会让公平最终无法实现,对法律本身也是个巨大的嘲讽。现在的“传染病源携带者公平就业”,就存在着法律最后被社会习惯性违法架空的风险。事实上,平等就业早已经是劳动法里面明文规定的内容,但五花八门的就业歧视仍然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违法主体还是政府部门。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保障传染病源携带者公平就业的目标已经确定,该通过怎样的手段来保证它的实现?

严格明细的违法惩罚措施当然是需要的,这是一部法

律得以落实的基础。但在此之外,谁来带头打破“不愿录用传染病源携带者”的怪圈也是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部门应该时时引领风气之先。很多时候,其他社会成员是把政府部门的行当成一种风向标的,政府部门如能建章立制带头雇佣传染病源携带者,不仅能对《就业促进法》起到最好的诠释,而且对其他用人单位的影响也将是十分巨大的。

这一点,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许多州都有专门的法律要求政府部门率先雇佣残疾人。法律不仅有宏观的要求,而且对政府部门雇佣多大比例的残疾人,什么岗位应该优先考虑残疾人都有详细的规定。当然,政府部门

如果违法的话,惩罚也是极其严厉的。这些法律让美国政府部门成为了雇佣残疾人的模范,也对促使其他用人单位公平雇佣残疾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让就业公平得以最大程度的体现。

反观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不仅没能带头雇佣残疾人和传染病源携带者,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带头制造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歧视。之前某政府部门在招女性公务员时要求“乳房对称”,就是最极端的例子。社会上如今就业歧视成风,一些带头违法的政府部门实在难辞其咎。现在《就业促进法》的大方向已经确定,这是好事。但政府部门能否带好“雇佣传染病源携带者”这个头,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本报评论员 赵勇

政府能否替助学贷款提供担保?

■公民发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12日在教育部门门户网站进行在线咨询时表示,目前一些学校规定毕业前没有还清助学贷款的学生一律不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国家并无这种规定。

(7月13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高校扣发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成风,而且一些银行也暗度陈仓削减助学贷款数额,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存在问题,即政府转嫁了自身责任。

我们知道贷款需要担保,但考虑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家庭贫困,所以国家规定助学贷款无担保,而是通过风险补偿金制度来保证银行的利益,风险补偿金由高校和地方财政各出一半。事实上,高校的风险补偿金同样出

自财政拨款,现在高校扩建,已经负债累累,它怎么能承受?不说地方财政能力各有差异,就算有能力,地方政府也没有动力主动出血。怎么办?

不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美国,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双重担保。这样不光改变了银行发放贷款、自己负担成本和风险,而利益无法保证的局面,而且履行了国家应尽的职责——通过举办高等教育,接受者固然提高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实际上,国家和全社会也受益匪浅,国家理应额外付出一部分成本:替那些不守信用者埋单。当然,如果能够完善制度设计,加大失信惩罚力度,这个额外成本并不会太高。只要政府切实履行自身责任,高校自然不要扣发毕业生的毕业证了。(王伟)

且看香港高官如何因道德瑕疵下台

■热点纵论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从目前的情况看,曾特首受到中央的支持和港人的拥护,地位稳如泰山。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好这份工”了,短短两星期内,就有两名高官下台。

(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最新下台的是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培。导致他请辞的导火线,是他下班后手挽艳女郎步出卡拉OK厅,而被撞破时又举止失常,竟避在艳女郎身后,被记者拍下的照片,表情十分狼狈。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在内地很可能被认为仅仅是“小节”而已。目光老到的凤

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就看出了这种差别,他在读到这条新闻时,语带双关地连问了三遍:“这点事算什么?”

但朱培培的下台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不管别人怎么评论这件事,在我看来,这却折射出了香港公务员能够长期保持廉洁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员有道德瑕疵就得下台!当然,严格说起来这种道德瑕疵不是“存在”的,而是已经被“发现”并进入了公众视野的。

如此对待官员是不是太严厉了呢?我以为不是。在公众眼里,官员并不是一个无害的“个人”,而是以公共权力掌控者、行使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他有明显的道德瑕疵,那公众又如何继续信

任他呢?这里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人既然可以背叛配偶,那他就也有可能背叛公众。公众没有义务容忍一个已经不被自己信任的官员继续掌权。

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不是对官员进行了有罪推定?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不如说是“举证责任倒置”更恰当一些,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官员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求公众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能对官员提出指控,那在客观上就等于包庇腐败分子。公众有权利发现蛛丝马迹就(通过媒体等)提出指控,而官员则有义务在这些指控面前自证清白。如果

不能或不愿自证清白,那就必须鞠躬下台,甚至要接受司法调查。这方面的例子,远有香港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眼下则是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培。

我们不难想见,如果内地的媒体和公众也拥有这种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的权利,比如发现官员住着和自己收入不相称的豪宅、或者和其他女人有暧昧关系、或者其合理收入不足以支撑儿女在国外的学费,就对他提出腐败指控,要求他自证清白,则内地清廉指数,将会上升多少啊!

“官员有道德瑕疵就得下台”——我看很有必要把这一原则引入内地。(郭松民)

医改切勿再迷信GDP和市场化

■公民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医改课题组负责人葛延风表示,医改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按照确定的服务项目,向城乡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免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只需要个人分担少量成本的基本医疗服务。

(7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尽管我国的卫生总费用飞速增长,但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和萎缩,居民个人支出的比重则急速上升。显然,这是医改改革过度市场化的结果。

因此,政府埋单的全民医保制度的确令人期待。此外还应看到,迷信GDP和市场化是造成当前医疗领域问题的根本原因。过去我们一直认为GDP增长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问题就能迎

刃而解。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GDP增长背后的不均衡问题,也就是说,GDP增长不是惠及到每一个人。

医院产出的是人的健康,但现在对医院的核算套用的是企业的公式,用结余多少来衡量院长当得好不好。由于医院总收入与病人付出的成本直接挂钩,为了多收入,医院和医生就会鼓励病人过度医疗。

因此,反思医疗改革,我们必须吸取两个教训:一是过度依赖“发展是硬道理”。与经济增长一样,让所有的人都能健康生活,也是硬道理,甚至是更硬的道理。二是要清楚地认识市场的局限性。医疗改革离不开市场,市场又有局限性。市场只关心效率问题,不关心公正问题,靠市场化解决不了公正问题,最多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作为公共产品,医疗卫生领域不仅需要效率,更需要公正。(王攀)